

# 曹植之失意文人形象及其遊仙詩創作

高明伊

## 摘要

曹植之失意文人的標籤在歷史迴響中得到了認可，但形成原因鮮有聯繫其遊仙詩創作。這一題材的詩歌佔據了曹植創作的七分之一，卻未得到廣泛的重視，僅歸為後期政治壓力下的產物。事實上，藩王身份賦予了曹植複雜的社會性，在入世與出世的選擇上難以完整地體現自我意識。本文以遊仙詩這一溝通了入世與出世橋樑的文學題材為例，結合曹植的政治活動，探討其失意文人形象被塑造的主客觀原因。

## 關鍵詞

曹植 遊仙詩 失意文人

## 一、前言

曹植（192-232）的「文人」身份是在後世迴響中被確認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兩晉南北朝時期。謝靈運（385-433）、劉義慶（403-444）等人紛紛稱讚曹植才學之高、才思之敏，<sup>1</sup>至梁朝蕭繹（梁元帝，508-555，552-554 在位）正式將其定性為「文士」<sup>2</sup>。

這種長久以來達成的認知顯然忽略了曹植個人身份的複雜性。作為曹操（155-220）認可的繼承人之一，曹植一度接近了最高統治者寶座。以其建安年間所作〈與楊德祖書〉中「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一語來看，曹植立場鮮明地表示了自己不

<sup>1</sup> （南朝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門」；劉義慶於《世說新語·文學篇》中遙補七步詩成詩的情境，後為《太平廣記》所引。參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三曹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95-96。

<sup>2</sup> 「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參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三曹資料彙編》，頁 100。

願因文采出眾而博名的願望，有「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志向。<sup>3</sup>這樣的願望另有早期詩歌〈白馬篇〉輔證。詩歌以「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sup>4</sup>兩句作結，通常被認為是詩人通過描寫少年遊俠的英姿，表現自己對建立戰功的渴望以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

在認可「金石之功」在曹植價值觀中的重要性之後，便能發現他要做的是「馭俠」之人。在〈七啟〉篇中，曹植假借「鏡機子」之口，一方面稱讚了田光（?-前227）、荊軻（?-227）等烈士的「果毅輕斷」，另一方面又指這些遊俠之徒「未足稱妙」。他自比的對象是田文（?-前279）與魏無忌（?-前243），即昔日的孟嘗君與信陵君。曹植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雄俊之徒」，從而「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sup>5</sup>在這樣的自我要求下，曹植身邊集結了以楊修（175-219）、丁氏兄弟（丁儀，?-220；丁廙，?-220）為代表的追隨者。

這幾位追隨者將文學才能與政治地位聯繫到一起。楊修在〈答臨淄侯牋〉中稱讚曹植「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sup>6</sup>發、旦分指文王與周公，對比曹操（155-220）〈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一句，<sup>7</sup>可見在楊修眼中，擁有文辭教化能力的曹植是曹操的不二繼承人。裴松之（372-451）注《三國志》時引《文士傳》丁廙答曹操的話，「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而為之死」，表現曹植「天性仁考，發於自然」的心性，與「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的才能。<sup>8</sup>

曹操所說的「唯才是舉」的取才標準，指向的「才」真的是文才嗎？橫向對比建安時期擅長於文壇的「七子」，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的不過王粲（177-217）一人，猶不及二荀（荀彧 163-212、荀攸 157-214）、賈詡（147-223）、鍾繇（151-230）等受曹操重用。事實上，從建安十六年（211），「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署，為丞相副」便能看出曹操對於繼承人的選擇並非猶豫不決。<sup>9</sup>是時，曹丕（魏文帝，187-226，220-226在位）已被認為是第一繼承人的「世子」。

<sup>3</sup>（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153-155。

<sup>4</sup>全詩為「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參（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411-412。〈白馬篇〉創作時間存疑，趙幼文認為此詩作於曹睿時期，因鮮卑強盛而憂心邊境，欲展所能。筆者更認同聶文鬱觀點，以詩歌風格及其中所推崇的俠義精神，推測應為曹植早期作品。參（魏）曹植著，聶文鬱注譯：《曹植詩解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4-7。

<sup>5</sup>（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11。

<sup>6</sup>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三曹資料彙編》，頁92。

<sup>7</sup>（魏）曹操著：《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5。

<sup>8</sup>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三曹資料彙編》，頁93。

<sup>9</sup>（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1〈魏書·武帝紀〉，頁8。

或許在曹操心中，他所賦予曹植的身份是曹丕的左膀右臂。曹植之「失意」應始於建安二十四年楊修之死。無論是作為謀士，還是作為友人，他的死對曹植打擊不小。待曹丕繼位，又誅殺了丁氏兄弟，自此公子座下再無門人。同時，曹植發現，他所期許建立的「金石之功」，已然渺茫不存。

曹植並沒有放棄完成個人價值的期許，仍然不斷上書。在〈責躬表〉中，他用極度謙卑的言辭反省自我，卻也不忘提出「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的請求。<sup>10</sup>太和年間的〈自試表〉與〈諫伐遼東表〉則是曹植以和止戰政治觀點的體現。<sup>11</sup>可以說，較之一帆風順的前期生活，曹植在人生的後半段擁有了更為精明的政治意識。<sup>12</sup>

然而，曹植的政治觀點與當權者是相悖的。儘管曹丕兩度興兵伐吳，但最終都被浩浩長江所阻，最終成為了兩場文學上的盛宴。<sup>13</sup>在其政治上書的同時，曹植以一個漂泊萬裡、故土難返的離人角度，書寫了〈門有萬里客〉這首感性的敘事詩歌。<sup>14</sup>但在魏明帝（曹叡，204-239，226-239 在位）看來，這首詩反對自己的用兵主張，無疑加深了帝王對這位頗具影響力的藩王的忌憚之心。

綜上所述，曹植得到「失意文人」的認知和接受或許來自於後世不得志文人對他產生的心理共鳴。自《世說新語》描寫了在楊修助力下，植與丕數次奪嫡交鋒，<sup>15</sup>到後世賦予其因「謙讓」<sup>16</sup>與「忠漢」<sup>17</sup>而致敗的形象，曹植的個人政治才能與政治目的均被忽視。他早期文章中所體現出來的浪漫與詩性、後期因打壓而在政治上毫無建樹共同成為了文人身份的佐證。

## 二、自我轉變下的遊仙動機

<sup>10</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268-270。

<sup>11</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506-507、508-509。

<sup>12</sup> 參孫明君：〈走向儒道互補——對曹植人格建構的動態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4 期，頁 14-22。

<sup>13</sup> 曹丕於黃初三年（222）作〈飲馬長城窟行〉、六年（225）作〈至廣陵於馬上作〉兩首五言樂府，均為伐吳之時所作，但兩戰皆無功而返，唯以詩歌留名。（魏）曹操、（魏）曹丕、（魏）曹植著：《三曹詩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頁 65、75。

<sup>14</sup> 詩云：「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見（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504。

<sup>15</sup> 楊修生平參《典略》，（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卷 19〈魏書·陳蕭王列傳〉，頁 558。

<sup>16</sup> （南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況於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奪嫡猶反手爾。植素無此念，深自斂退」，轉引自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三曹資料彙編》，頁 115。

<sup>17</sup> （明）李夢陽〈曹子建集十卷本序〉云：「且以植之資，稍自矜飭，奪嫡特反掌耳。而乃縱酒鐘噉，以明己無父兄之心，善乎！」轉引自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三曹資料彙編》，頁 127。

政治上的失意，使曹植被動完成了由「貴公子」到「落魄王侯」的身份轉變。這種身份轉變又促使曹植回到了文學創作上。他之所以不願意以文章傳世的原因之一要數「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sup>18</sup>針對這一點，在其早期〈與吳季重書〉中亦有論述：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sup>19</sup>

由於在作文時難以做到沒有缺漏和弊病，同時又要結合音律，超越常人，這使得其從古到今傳世文章的數量並不多。曹植所謂小道的辭賦，是那些質量、標準達不到要求的文章，這並不意味着他不認可文章的價值。在〈薤露行〉<sup>20</sup>中，一方面曹植有着「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的自我肯定；另一方面，他知曉自己的抱負只能從「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芳」的文學途徑上實現。時至太和，「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sup>21</sup>這樣的忠心並不足以打動君王，縱然曹植將發生的天災同當年成王忌憚周公而不信，貶斥在外所引發的天災聯繫在一起，以「悲且長」的感慨來寓意「莫相忘」的悲憤，君王也不會賦予他實權。這種轉變是退而求其次的不甘，是身心束縛下的鏗鏘而行，促使他不得不走向了「憂」的情懷，激發了他「生的苦悶」。要解脫生的苦悶，曹植就不得不嚮往藝術的世界。<sup>22</sup>

### （一）屈原及其文學傳統

因此，當早期自比孟嘗（?-前279）、信陵（?-前243）的願望破滅，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後，曹植重新尋找了一個仿照的對象——屈原（前340-前278）。兩人都身處在諸侯割據的年代，也都經歷了從政治核心到被邊緣化這般相似的人生際遇，在身份上也有着身為王侯的共通性。同時，屈原之「失意」，也在漢代得到了長久的迴響與認可。

自賈誼（前200-前168）〈吊屈原賦〉始，「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sup>23</sup>抒發了對屈原生不逢時的歎息，也替此後為君王所嫉，懷才而不遇的士人展示了價值的標杆。其後，司馬遷（前145-?）在〈太史公自序〉中以「屈原放逐，著〈離騷〉」，來表明「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的創作觀點。<sup>24</sup>班固（32-92）進一步給出了屈原創作的緣由，「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sup>18</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153。

<sup>19</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142-143。

<sup>20</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433。

<sup>21</sup> 出自曹植詩歌〈怨歌行〉，（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362。

<sup>22</sup> 滕固：〈中世人的苦悶與遊仙的文學〉，載氏著，沈寧編：《挹芬室文存》（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頁302。

<sup>23</sup> 李誠，熊良智主編：《楚辭評論集覽》（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1。

<sup>24</sup> 李誠，熊良智主編：《楚辭評論集覽》，頁5。

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sup>25</sup>由於心中的憂愁，無法紓解，因此作文而傳情。「憂」成為了被公認的屈原的情感主體，曹植以己度之，產生了共情。這種相似的情感皆由於政治上的失意，從屈原的傳世文章來看，除卻為抒發「憂」而作的〈離騷〉，另有〈遠遊〉給出了具體排解的方式。<sup>26</sup>

王逸注曰：「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屈原憂愁君王為奸佞圍繞，被排斥在外且沒有傾訴的對象，因而他「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而遊的方法，是「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淒而增悲。神儻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的形與神的分離。屈原達到的境界是「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的形的坐忘，與在精神上「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的超脫。可是，屈原真的超脫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屈原具有的「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sup>27</sup>的人生觀，使得他「遠遊」之後仍需回到現實世界，而「遊」的過程也就成為了一種逃避。這種逃避是短暫的，屈原越是清醒，所感受到的痛苦也就越重。對曹植來說，一方面他擁有着聯繫現實世界的渴望，這種渴望帶給了他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他卻並沒有表現出獨善其身的自持。因此，他的痛苦較之於屈原要更為複雜。然而，排解痛苦的途徑確是一致的，今人李豐楙提出的遊仙文學之永恆主題「憂與遊」，<sup>28</sup>正是由屈原建立，由曹植繼承的文學傳統。

## （二）道教及其文學潮流的興起

曹植繼承了屈原「遠遊」的文學傳統，具體到遊仙，就不得不涉及當時興起的道教文學。「遊仙，即在意識和觀念中虔信仙界的存在和仙人之無虛，在日常生活和行動中努力超越生命極限，達到永生永恆，就是古代中國人渴望突破有生，進入無驗的一個極好的例證。」<sup>29</sup>也就是說遊仙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相信神仙；二是希冀於突破現實世界。

如今學界的主流觀點是趨向於曹植不相信神仙，<sup>30</sup>以其早期作品〈辯道論〉<sup>31</sup>、中期〈贈白馬王彪〉、〈毀鄧城故殿令〉<sup>32</sup>、後期〈誥咎文〉<sup>33</sup>為主要依據。然而，細究詩歌內容，不如將曹植的表態視為理性的思辨意識。以〈贈白馬王彪〉為例，曹植在序中言明是「憤

<sup>25</sup> 李誠，熊良智主編：《楚辭評論集覽》，頁18。

<sup>26</sup> 〈遠遊〉的作者存在一些爭議，朱光潛認為這是漢初之作，蓋因王子喬、赤松子神仙形象出現時間較晚。本文不作篇目考據，以《王逸注楚辭》：「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為準，歸〈遠遊〉至屈原名下所作。參朱光潛：〈《楚辭》和遊仙詩〉，載氏著：《藝文雜談》（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頁220；何錡章編：《王逸注楚詞》（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頁99。

<sup>27</sup> 何錡章編：《王逸注楚詞》，頁111。

<sup>28</sup>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仙道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6。

<sup>29</sup> 汪湧豪、俞灝敏：《中國遊仙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2005），頁3。

<sup>30</sup> 例如羅宗強認為，曹氏父子在重性情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在於他們都重人事，輕鬼神。參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1。

<sup>31</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186-189。

<sup>32</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294-300、248-249。

<sup>33</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456-457。

而成篇」。詩人心情激蕩寫下的文字，是其本能的體現，並非深思熟慮所得的結果。觀其「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兩句，同曹操〈短歌行〉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sup>34</sup>四句抒發的是類似的感慨，這是時代的聲音，是現實社會由戰亂闡發的對生與死的思辨。

此外，曹植所認可的長壽途徑是「善養」，方士推崇神仙之道，從而長壽，使得曹植不得不思考神仙存在的真偽。因此，在〈釋疑論〉中，基於左慈的長壽，又見甘始所制丹藥能讓投入沸脂中的魚「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sup>35</sup>他開始猶豫起了自己早年的判斷，道「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懷疑的種子一旦被種下，便會不斷地生根、發芽，從而動搖到認識。

審視道家的核心思想「養生」便能發現，在漢初，黃老學派將「動」化為「順」，強調了「天道」的作用，講究順時順勢，要求統治者達到「清靜無為」的狀態，而非依靠人力作用。<sup>36</sup>追溯先秦時期，莊子（前 369-前 286）善於以神話故事為喻，闡述自己的觀點，現在通常視之為遊仙文學的開端。而其中的核心觀點提煉之後有二，一是作為手段的「無為」，二是體現其理想境界的「逍遙」。這是一種超脫於現實世界的理想境界，然而正如屈原之所不可及，曹植也同樣無法達到這種境界。因此，他所接受的，是在漢樂府中已然獲得了共鳴的「如寄」之語。《尸子》云：「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故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sup>37</sup>將自身設為天地間的客體，氣凝則形化，氣散則形移，人之於天地，不過渺然一粟。古詩十九首之〈驅車上東門〉有句「人生忽如寄」，<sup>38</sup>也是對人生短暫的感慨，恰如曹丕在〈善哉行〉中感歎的「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sup>39</sup>這是時代賦予曹植有別於屈原的情懷。

### 三、曹植與其遊仙詩創作

曹植在其遊仙詩創作過程中，完成了對屈原的學習與繼承，也吸收了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諸多哲學觀點與社會風氣。綜觀曹植現存的十一首遊仙詩，若將其視為整體，則構成了「遊」的過程：初至異地時的震撼、驚訝；忽見主人，於是主客之間有了來往，遊覽到了更深的境地；最後歸家時，客人心中眷眷不捨，感慨萬千，徘徊而不願去。

<sup>34</sup> 趙福壇選注：《曹魏父子詩選》（香港：三聯書店，1982），頁 16。

<sup>35</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396。

<sup>36</sup> 參熊忭：〈漢初黃老政治何以成為可能〉，《史學月刊》2017 年第 8 期，頁 27；廖書賢：〈由道到術：西漢黃老政治思想的演變〉，《育達科大學報》第 44 期（2017 年 4 月），頁 61。

<sup>37</sup> （戰國）尸佼著，汪繼培輯：《尸子》（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57。

<sup>38</sup> 楊效知著：《古詩十九首鑒賞》（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頁 57。

<sup>39</sup> 趙福壇選注：《曹魏父子詩選》，頁 58。

### (一) 自我價值的肯定

在「遊」的最初階段，曹植保持了對自我的肯定。他以旁觀者的姿態來對仙人進行書寫，此時的他，儘管遭受到了政治環境的壓力，但仍未陷入完全的失望。〈桂之樹行〉就直接明瞭地提到了「無為」這一哲學思想，<sup>40</sup>但此時的曹植並未表現出接受的態度：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蟠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澹泊、無為、自然。乘躡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眾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曹植首先著意刻畫了仙境桂樹綺美的形象，此處的桂樹，紅花綠葉，香氣逼人。通過書寫樹上樹下盤桓的鳳類的鸞鳥與龍屬的蟠螭，彰顯桂樹卓越的地位。在這樣的桂樹下，才有了講道的仙人。曹植賦予了仙境超脫於現實世界的美，此間的仙人所闡發的「道」，正是「澹泊、無為、自然」的哲學思想，唯有這般行事，才能達到「乘躡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眾外，下下乃窮極地天」的逍遙。這是對莊子思想的闡述，而作為詩歌主體意象的桂樹，在《莊子·人間世》亦有提及，「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sup>41</sup>莊子以此來闡發有用之材夭於斧下，無用方能保全自身的道理。曹植此間的遊仙詩創作，並不認為自己是個無用之人。他以聆聽者的身份完成了遊歷的記錄，用華美的文辭展現境的超越性，但並未對仙人所講之道表現出認可的態度。

另有兩首〈升天行〉表達了同樣的情懷。「翔鸞戲其巔」、「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所描寫的鸞鳥與扶桑木均出於《楚辭》。<sup>42</sup>前者可見於宋玉（前 298-前 222）〈九辯〉「雁雍雍而南遊兮，鷓鴣啁哳而悲鳴」一句。<sup>43</sup>宋玉借用鷓鴣雜亂細碎的叫聲來烘托悲涼的秋日之景，曹植反用其典，展示其嬉鬧的場景，以展示蓬萊山這一「乘風忽登舉，彷彿見眾仙」的神仙之境。另一意象扶桑木則出於屈原的〈東君〉，「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sup>44</sup>同樣，與屈原所展示的楚文化中對太陽的崇拜不同，曹植所表達的是「願得紆陽轡，回日使東馳。」這般對時間回溯的渴望。日落之後仍會升起，這是周而復始的規律。然而對曹植來說，朝陽所代表的活力、希望已經離他遠去。來到這太陽初升的地方，只願手中能握有韁繩，重新來過。

除此之外，此兩首詩歌中，曹植還用到了「蘭桂上參天」和「玄豹遊其下」這兩個意象。由於〈招隱士〉開篇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因此有學者以桂樹象徵遁居山谷之人。<sup>45</sup>但是，曹植以屈原為仿照對象，終其一生都關注政治，故不作隱士論，他只是依從神話

<sup>40</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399。

<sup>41</sup>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186。

<sup>42</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266、267。

<sup>43</sup> (戰國)屈原著，陸侃如、龔克昌選譯：《楚辭選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33。

<sup>44</sup> (戰國)屈原著，陸侃如、龔克昌選譯：《楚辭選譯》，頁 21。

<sup>45</sup> 參余冠英選注：《三曹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 55。

傳說中桂樹生長在蓬萊山附近的說法。<sup>46</sup>玄豹這一意象也表現了曹植一邊肯定自我價值，一邊又持趨利避害的人生態度。〈陶荅子妻〉云：「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sup>47</sup>玄豹自身的稀有性，使得它們容易受到戕害，而避禍的方法是藉助外界環境自污其身。也因此，曹植以言行上的不羈授曹丕、曹叡父子把柄。黃初二年（221）「醉酒悖慢，劫脅使者」這一罪名是曹植自污的開始，<sup>48</sup>也是他試圖反抗的行動。曹植保持了一種對世間的嚮往，他之所「憂」尚未被完全激發。

## （二）「忘言」與服藥的選擇

曹植所達到的「遊」的第二階段，有了「仙人授藥」和「教我忘言」的交流。在這一階段中，基於現實世界的痛苦變得清晰，曹植對於精神世界有了較高的接受度。

### 1. 無可言的現實境況

曹植在現實中無可言的境地可見於〈苦思行〉：

綠蘿緣玉樹，光曜燦相輝。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  
鬱鬱西嶽巔，石室青青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吾遊，教我  
要忘言。<sup>49</sup>

詩歌開篇仍是對仙境的描寫，攀附着綠蘿的光芒閃耀，呈現了光明所照的仙境。曹植塑造了藤蘿與樹木相依相繞的美，並為後世不斷書寫。此時的曹植不再局限於旁觀者的身份，他見到樹下的真人即將高飛而走，心生出的是踴躍追逐之情。曹植接受仙人的指引，見到了鬚髮皆白的隱士。在伴隨隱士遊歷仙境的時候，曹植接受了忘言的諄諄教導。

這種隱逸的潮流始於東漢末年。而遊仙文學同隱逸文學在發展之初就有着相對密切的聯繫。以上述老莊哲學、屈騷思想為例，從內容上看，一定程度上都包含了對現實社會的逃避，表現出一種相對於積極於世的趨向。<sup>50</sup>外戚、宦官的交替掌權，使得諸多有志之士難以抒發自己的抱負。以張衡（78-139）為代表，當皇帝向他詢問天下人痛恨的對象時，遭來了「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的禍患。在吉凶難明、禍福不知的情況下，張衡只能借文寄意，作〈思玄賦〉以避禍。<sup>51</sup>

<sup>46</sup> 聶文鬱則認為這與神話體系相關，並引《文選》李善注：「南海有桂，故曰桂海」以及范成大《石湖集》卷14云：「須知桂海接蓬瀛，滿目三山三銀闕。」本文依從此說。參見聶文鬱注譯：《曹植詩解譯》，頁301。

<sup>47</sup> （西漢）劉向編撰；張濤譯注：《列女傳譯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頁72。

<sup>48</sup> （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卷19〈魏書·陳蕭王傳〉，頁561。

<sup>49</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316。

<sup>50</sup> 學界大多將老莊、屈騷等歸於隱逸文學，或將其認為是隱逸文學的萌芽，參楊清之：《唐前隱逸文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

<sup>51</sup>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59〈張衡傳〉，頁1914-1915。



賦中「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餘宿乎扶桑。嶺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昆侖之高岡」，描寫了一段完整地遊歷神仙境界的過程。然而，「遊」並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張衡作此賦大量用屈騷典故，也繼承了屈騷中對現實的回歸的思想。他以「雖遨遊以偷樂兮，豈愁慕之可懷」的反問，申明遠遊縱然是歡愉的，卻也是短暫的，真正得以永恆的還保留在現實世界中。可悲的是，現實的境遇又是這般不堪，剩下的選擇只能是逃避。與張衡面對宦官強權勢力而只能以「詭對」來回應皇帝疑問的處境相似，曹植所處的也是一種無可言的狀態。一方面，他所上書的志向不被採納；另一方面，他的怨懟之言又會成為論罪的把柄。何以達到「鬚髮皓然」的隱士境界，所行之道唯有「忘言」，這是自我紓解下，意圖將現實的苦悶拋之腦後而嚮往的長生。

## 2. 授藥長生的希冀

「忘言」能夠讓曹植逃避掉來自政治壓力的問責，然而情感積壓下，心中的鬱結更難抒發。因此，曹植找到了第二種排解，或趨向於逃避的方式，通過抵達仙境—仙人授藥—服食長壽這樣的過程，完成了詩歌的創作，具體可見於〈飛龍篇〉、〈平陵東〉二首：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飛龍篇〉）<sup>52</sup>

閭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平陵東〉）<sup>53</sup>

泰山和天衢是連接人間與仙境的地方。曹植另有〈驅車篇〉對泰山一行有更為詳細的敘述，<sup>54</sup>此處暫不贅述；天衢出自〈遭厄〉篇的「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蕩」，<sup>55</sup>指向了通天之道。到達仙境之後，曹植所見的是容貌姣好的童子，座下所乘預示着祥瑞的白鹿，手中所持是記載於〈西京賦〉的仙草靈芝。服藥而求長生，是從建安到魏晉形成的另一風尚。在這個時期，身為名士有兩樣東西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是酒，還有一個就是藥。<sup>56</sup>曹植本身是極好宴飲的，然而人在痛苦之時，酒往往也就加重了愁的滋味。此外，曹植早期的貴

<sup>52</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397-398。

<sup>53</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400-401。

<sup>54</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404。

<sup>55</sup> 何錡章編：《王逸注楚詞》，頁 242。

<sup>56</sup> 參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載上海第二機電工業局工人理論學習小組、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一九七三級工農兵學員選編：《魯迅雜文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上冊，頁 166-180。

公子宴飲享樂生活，往往任性而行，乃至於醉酒誤事，這亦是他今時今日失意的緣由之一。在這樣的基礎上，退而求其次的仙人授藥便成了他的解脫方法。

《世說新語·言語》中記載了何晏（195-249）「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的觀點。<sup>57</sup>儘管史籍中不見曹植服食五石散的記錄，但從植、晏二人生活環境和背景來看，並不能排除曹植接觸過五石散的可能。兩人在生活習性上的諸多相似，兼之以曹植在詩歌中提及的丹藥推測來看，這是曹植選擇的另外一條逃避的途徑。在藥物的作用下，得到的是一時的歡愉，可將人之精氣神激發到了極致。

這種歡愉使得曹植留戀於其中，〈五遊詠〉篇中進一步完成了對現實世界的拋棄：

九州不足步，願得陵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  
華蓋芬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閭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  
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58

「九州」一詞與「四海」並稱。《尚書·禹貢》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是將這兩個詞定義為天下。<sup>59</sup>莊子開拓了這個範圍，給出了「四海之外」的神仙之境。曹植在詩歌開篇即道「九州不足步」，對他來說，天下雖大，卻「在生活上得不到居住的安寧」。<sup>60</sup>不斷地遷徙使他失去了可以稱之為「家」的所在，而與兄弟親人的長期分別又使他難以得到親情的慰藉。曹植與人世間最緊密的關係在王權更迭中越來越弱，這使他只能嚮往「八紘外」的方外之境。現實中的困苦使曹植只能在仙境中披上「丹霞」與「霓裳」織就的華衣；同時，仙境之主的帝后贈以瑤佩，飲以沆瀣，表現出對他的認可。作為落魄王侯的曹植，在詩歌結尾處讚歎仙藥所帶來的無疆之壽，是希望可以通過服藥以延長其在精神世界中的遨遊。

### （三）徘徊不願去的留戀

人生的短暫是歷代君王追求長生的主要緣由，對曹植來說，他對方士的看法、或者說對神仙是否存在這一問題的看法的轉變最直觀的原因是方士的長壽。然而，曹植是否嚮往長壽，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或者說，曹植在詩歌中流露的，是想要擺脫現實生活的困苦與華美綺麗的世界的願望。因此，曹植遊仙詩中所提到的「長生」等詞彙，有必要解讀為依存於精神世界的不朽。

<sup>57</sup> （南朝宋）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18。

<sup>58</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401。

<sup>59</sup> 李民、王健撰：《尚書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83。

<sup>60</sup> 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頁18。

### 1. 主客分離視角下的長生

曹植在〈仙人篇〉中的「人生如寄居」之語繼承自古詩十九首，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時代思潮所賦予他的獨特之處。在「韓終與王喬」的指引下，仙人「要我於天衢」。<sup>61</sup>曹植見到的是「閭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這般壯麗之景，站在「虛」的高度上俯觀「實」，曹植將自身作為天地間的客體，完成了對「虛」的肯定與對「實」的拋棄。他不禁流連於「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的神仙之地，無論是軒轅氏得道之地的「鼎湖」，或是出於〈離騷〉「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的「九天」，<sup>62</sup>所呈現的廣闊空間均有別於現實。

上文提及的〈驅車篇〉是對這一視角的進一步確認：

驅車揮鷲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嶽專其名。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上有湧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系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餐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此詩作於太和年間，因蔣濟（?-249）於太和四年（230）上書奏請曹睿封禪之事，故有學者認為，詩中唯有軒轅氏得以永生的原因體現在了「唯德享利貞」，是諷諫帝王要修德行。而黃節（1873-1935）以其名同〈驅車上東門〉前二字，云「舊作下言人生如寄，服食求仙，植詩意殆與之合」。<sup>63</sup>兩種說法各有道理，後者更為契合。黃注此詩「黃帝且戰且學仙，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sup>64</sup>軒轅氏所修之德，在某種意義上是修仙之道。如果這是一首諷諫的詩歌，那麼他所祝願的能同黃帝一般得以長生的對象應當是明帝。而封禪一事自三代以來，有記載的只秦始皇（嬴政，前 259-前 210，前 247-210 在位）、漢武帝（劉徹，前 157-87，前 141-前 87）、漢光武帝（劉秀，前 5-57，25-57 在位）三人。從當時天下仍處於三分的情況來看，明帝「聞濟斯言，使吾汗出留足」的反應是可信的，即使「後遂議修之，使高堂隆撰其禮儀」，<sup>65</sup>也應是青龍年間（233-237）廣修宮室、召納方士之後的事情了。以明帝的反應以及曹植薨於太和六年（232）來看，他參與其中的可能性並不高。因此，如將視角轉回詩人主體，將之視為詩人的精神寄託，就形成了一種自我叩問。

<sup>61</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263。

<sup>62</sup> 何綺章編：《王逸注楚詞》，頁 6。

<sup>63</sup> 此詩所含意蘊各家觀點不同，聶文鬱以此篇為諷諫曹睿封禪泰山之事所作；趙幼文將此篇擬作太和三年植封東阿王后，經泰山所作；史載有封禪於前者，僅始皇、武帝、光武三人。光武尚頗遭詬病，蔣濟上書勸明帝封禪，此舉意多不明。且詩中意象多見於神話志異中，故此三者筆者以黃注為善。參見聶文鬱注譯：《曹植詩解譯》，頁 252；（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 406；（魏）曹植著，黃節註，葉菊生校訂：《曹子建詩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頁 107。

<sup>64</sup> 黃節註，葉菊生校訂：《曹子建詩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頁 108。

<sup>65</sup> 黃節註，葉菊生校訂：《曹子建詩註》，頁 109。

對於曹植來說，雖有藩王之名，卻並沒有王侯的實質，碌碌無為的人生又何必歆羨長生。想要在現實生活中永世不老的，唯有那些建立了不朽功業的帝王。他們主宰着塵世，將自己作為主體。但曹植不過是個寄居在此的客體，生之於他，已然不是追求的目標。那些帝王追求長生的方法大多是「服食求神仙」，但往往「多為藥所誤」，真正得道的唯有黃帝一人。正如曹植所選擇的，通過服藥得到的歡愉，並未於現實世界中實現：一時的歡愉之後，他不得不再次回歸到苦悶。

此外，詩歌首句與〈青青陵上柏〉的「驅車策駑馬」僅一字之差，<sup>66</sup>與曹植去往的泰山不同，這一句後跟的目的地是宛與洛，也就是南陽與洛陽。昔日在洛陽城中的子弟所享受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詩人感歎道，「極宴娛心意」，這就與曹植早年在許都的生活相似。建安年間，曹植也是常常飲宴交友，揮毫就詩，如「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甘」、「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等。<sup>67</sup>這是貴公子招攬文士的一種手段，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文化風氣。因此有了「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的一時盛況。<sup>68</sup>如今，時過境轉，曹植在不斷地遷謫中奔波，被現實所拘束的他，嚮往的是超脫在這精神世界中的不老。在精神世界中，曹植才能成為個人的主宰。

## 2. 無從釋懷的憂思

在曹植對屈原的繼承與仿照中，其間的不同之處在上文中已有所敘述。然而，這種傳承在歷史追問中得到了認可，是由於曹植在遊仙詩創作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的憂思。

以〈遊仙〉為代表，開篇就點明了題旨，所行的緣由在於「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sup>69</sup>這是對漢樂府「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繼承，<sup>70</sup>強調了生命的有限與現實的不堪。因此，他「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來到了軒轅得道之所，進一步暢懷「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站在高處，曹植能遊覽的，是「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邱」的仙境。「扶桑」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弱水」鴻毛不浮，圍繞着西海中央的鳳麟洲。<sup>71</sup>玄天所指北方之天，「丹邱」出自〈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sup>72</sup>指向了晝夜長明的明光之地。曹植以遊覽作結而不設歸途，希冀於形神合一的超然。

<sup>66</sup> 楊效知著：《古詩十九首鑒賞》，頁1。

<sup>67</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47、49、178。

<sup>68</sup> （梁）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拾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284。

<sup>69</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402。

<sup>70</sup> 楊效知著：《古詩十九首鑒賞》，頁70。

<sup>71</sup> （漢）東方朔撰：〈海上十洲記〉，（晉）葛洪等撰，熊憲光選輯、點校：《古今逸史精編·西京雜記等八種》（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頁215。

<sup>72</sup> 何錡章編：《王逸注楚詞》，頁99-106。

然而，屈原以自沉汨羅江作為最後的反抗，儘管曹植在生死一事上有着不同的選擇，但他亦如屈原一般，無法得到真正的超然，以其〈遠遊篇〉與屈騷相承：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鼈戴方丈，神嶽儼嵯峨！  
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饑，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  
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sup>73</sup>

曹植作為被打壓的藩王，無法遊歷「四海」所代指的天下。因此，詩中所指的「遠遊」之處顯然具有了空間上的高度。「俯仰」一詞表明了身之所在，對於曹植來說，腳下的山川河流太過於渺小，仙境中的高山之上，是同遊的仙人。當他肆意享樂的貴公子生活遠去，即使真想「長嘯」而歌，也時時受到監視，更容易被冠上不敬怨懟的罪名。因此，坐享萬乘對於曹植來說已經不是人生目標，他所希望的乃是同日月星辰並行的快哉意。

儘管在曹植筆下，結尾往往收束於對景致的書寫，忽略了從「遊」到「歸」的過程。然而，結合他生平經歷來看，仍是一種雙向的「遊」。正如屈原在遠遊之後仍不忘民生，不忘諷諫君王遠離小人，曹植亦有着相似的心願。在曹植筆下，他表現出了對兄、侄的過度尊敬。正如在他晚期所作〈改封陳王謝恩章〉所云，「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答」。<sup>74</sup>曹植希冀重回政治中心，對於點滴恩賞都視之為「滂霈」，這使他之所憂更為顯著。曹植渴望得到個人價值的認可，因此即使在仙境之中也遵從了「謁東父」的禮儀章程。

#### 四、結語

綜上所述，曹植在其遊仙詩創作過程中統合了虛與實之間的自己，他所營造的安然、閒適的仙境生活狀態與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事實上形成了雙向的「遊」，最終回歸到了現實世界。在創作手法上，曹植有意識地運用了「充滿了在修辭等級較低的詩歌中見不到的字句和話題」，<sup>75</sup>通過對以屈騷為主的先秦、兩漢文學的用典，塑造了自身華美如瓔珞散地的行文風格。儘管曹植在潛意識中並不相信神仙的存在，但由於外在的壓力迫使他不得不尋求這一種超越性的橋樑。「遊仙」之於曹植，是一種逃避，也是一種情感的宣洩。在超脫精氣神的狀態下，曹植擁有的的是筆下璀璨，是超越了時代，歷經千年的不斷迴響。「失意」這一心理狀態成就了曹植的遊仙詩創作，完成了文人視角下對這一題材的進

<sup>73</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265。

<sup>74</sup> (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頁499。

<sup>75</sup>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胡秋蕾、王宇根、田曉菲譯：《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201。

一步開創。同時，他所作的「遊仙詩」也因其特殊的題材使得曹植的個人抉擇帶上了痛苦的哀歎，加重了後世對其「失意」的認識。